

高校外语教师的 合作性行动研究

以《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教改为例

吴新云 曲亮◎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本科专业提升计划暨专业综合改革建设”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自筹经费）项目（06AIS0670011）成果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2016年度教学方法研究项目”（JFY201619）资助第五章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一般项目”资助第三章研究

高校外语教师的合作性行动研究： 以《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教改为例

吴新云 曲亮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校外语教师的合作性行动研究：以《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教改为例 /
吴新云等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7

ISBN 978 - 7 - 5130 - 5639 - 7

I. ①高… II. ①吴… III. ①高等学校—外语教学—师资培养—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4279 号

责任编辑：贺小霞

责任校对：谷 洋

封面设计：刘 伟

责任印制：孙婷婷

**高校外语教师的合作性行动研究：
以《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教改为例
吴新云 曲 亮 等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29 责编邮箱：2006HeXiaoXia@sina.com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10.75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60 千字 定 价：4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5639 - 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从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困境说起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课题的方向、意义、文献综述	3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基础	6
第一章 掌握方法：“合作性行动研究”概论	10
第一节 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发展历程	10
第二节 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特点和界定	21
第三节 教育领域中的合作性行动研究	26
第二章 发现问题：《中国文化概论（英）》的课程现状	31
第一节 英语学习中的“中国文化需求”	31
第二节 《中国文化概论（英）》教学改革的方向	37
第三节 教师“角色”的转变	41
第三章 改进教学：对“内容形式”的合作性行动研究	46
第一节 教学内容的专题设计	46
第二节 课堂教学中思辨力的培养	55
第三节 测试体系的建设	59
第四章 收集反馈：对“教学效果”的合作性行动研究	66
第一节 关于“文化词汇”的教学反馈	66
第二节 关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反馈	73



第三节 关于师生“主体性”的教学反馈	81
第五章 再次改革：对“翻转教学”的合作性行动研究	90
第一节 课程的“翻转教学”设计和功能	90
第二节 学生“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95
第三节 教师推动学生课堂讨论的策略	104
第六章 外语教师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反思和前景	111
第一节 外语教师个体参与“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前景	111
第二节 单位支持大学外语教师“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前景	118
第三节 国家鼓励外语教师“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前景	124
参考文献	132
一、英文文献	132
二、汉译文献	144
三、中文文献	145
附 录	149
第二章附录1 “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测试卷	149
第二章附录2 《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现状”调查	155
第四章附录1 《中国文化概论（英）》“词汇教学效果”问卷	157
第四章附录2 《中国文化概论（英）》“能力培养”问卷	159
第四章附录3 《中国文化概论（英）》“主体性”访谈表	162
第五章附录 TBL（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效果调查表	164
后 记	165

绪论 从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困境说起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语老师的科研能力被视为专业素质的一部分，很多学者都撰文提到这个问题。夏纪梅称外语老师的素质包含外语教育知识和观念、外语教学能力与研究能力（2002：36）。刘润清指出，外语教师的素质包括流利、地道、规范的英文，宽泛的知识面，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科研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爱学生（2004：16）。戴曼纯、张希春认为外语老师的素质表现为扎实的基本功、教学效果好、较强的科研能力、外向的性格和身心健康（2004：46）。

然而，中国外语教师在科研方面的“薄弱”问题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包天仁在2005年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语教学学术年会上的报告《当前我国高等师范外语教师教育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最可怕的是我们缺少科研，高等师范外语院校英语院系的科研要比别的院系差。”其实不仅在师范类外语院校中，在其他类型的高校中许多外语教师也同样面临困境。为从数据上看清这个问题，我们曾对自己所在院系的外语教师的科研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当时在岗的所有30名不同年龄段的数科外语（英语、俄语、法语）教师在2004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三年间在学校科研系统登记的科研成果。（1）除去译文、教材、注释读物及与从事专业无关的内容，第一年12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23项，第二年26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63项，第三年26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56项；（2）由于公开出版的各类论文集参差不齐，发表的论文质量难以界定，我们在第一项结果基础上再除去论文集的文章，那么第一年8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10



项，第二年 7 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 13 项，第三年 17 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 21 项；（3）由于学报、杂志增刊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照顾科研能力较弱的教师而设的，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承认，但其性质与论文集雷同，我们又在第二项结果的基础上除去增刊上的成果，那么第一年 8 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 10 项，第二年 6 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 11 项，第三年 12 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 13 项；（4）除去尚未结项的科研项目为名的成果，只统计发表在以国家图书馆发布的期刊为标准的核心期刊的成果，结果三年来有 5 位教师有科研成果共计 6 项，其中一位教师为第二作者（吴新云、黄振华，2007：175）。所以从感性认识和上述的调查结果不难看出，外语教师做出严格意义上像样的科研成果真是很难。

科研难引发了高校外语教师的焦虑，有些人抱怨教学任务繁重，所以“没有时间”从事科研；有些人觉得年龄、知识结构、学历层次、学术氛围等因素阻碍了自己的科研能力的发展；有人避重就轻，注意力放在教材编写、跑横向项目、编写论文集之类的活动上；有些人采取“互助”行动，一人完成的科研成果由多人署名，彼此共享；还有人动用社会关系，在熟人、朋友等关系人的科研成果后署名，或者花钱买署名，使得个人自己的不少科研成果间无丝毫的关联度，也与外语专业无关，“不务正业”现象严重。

抱怨和不当行动其实无助于外语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而且，科研真的很有必要，有助于外语教师的教学质量的提高，科研量少的话，就难以在教学方法的改革、知识更新方面有所成就，也就从整体影响了外语教学工作的成效，往往形成事倍功半的结果。关于如何克服外语教师科研弱势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建议多多。有人提出的迫切培训需求是“出国进修以提高听说能力和获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前沿理论和实践”，还渴望“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研究能力和一些关键技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强调“跨学科高学历学习对提高研究能力的重要性”（李洁、刘孟欣、张凤华，2007：134）。可以说，大学外语教师的科研水平整体不高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切的，但具体的、有效的方案还没有出现，这个形势将促使更多的学者努力探索，任何有效提高外语教师科研

能力的成果都将吸引大家的关注。

我们认为，提高高校外语老师的科研能力要探讨和解决的具体问题应该是：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有特殊性吗？外语老师整体研究能力的局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否在特定的时间里得到解决？制订解决方案的依据是什么，实施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调整？一个阶段（比如一两个学年）后的成效如何？未来还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我们的基本认识是，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一般性就是得遵循科学的基本规律，提出问题并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和程序来解决问题，特殊性就在于外语教师确实教学任务相对其他学科更为繁重，而且课程教学往往与硕士、博士时的研究方向脱节，形成教学科研两头忙、两头不能兼顾的局面，也造成了外语教师整体研究能力薄弱的现象。要想在特定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减少外语教师的授课量，让外语教师所上课程与其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二是要坚持科研“从教学中来到教学中去”的原则，使外语教师从繁重的教学中获得乐趣和成效，从复杂的科研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能力。两种方案都会遇到问题，第一种由于高校现实的学科和课程设置，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第二种实际上想让教学和科研融为一体，但外语教师大多在教学理论上有欠缺，需要一定的指导，而成果和成效都需要时间来考察，未来的改进也需要在实践结果的基础上得出。

二、课题的方向、意义、文献综述

考虑到大学外语课型大类的相似性、大学外语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高校提高英语教学水平的迫切性，我们解决大学外语教师科研困境的基本方案是“合作性行动研究”（界定、特色等见第一章），即同一课程的几位老师，或者对同一门课感兴趣的数位老师，组成研究小组集中研究某个或几个课堂上出现的问题。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寻找与教学相关的可以进行“合作性行动研究”的方向。

我们课题组选择《中国文化概论（英）》作为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切入点。《中国文化概论（英）》指的是用英语讲授的《中国文化概论》的课



程。《中国文化概论》课于1999年被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主干必修课，现已逐渐成为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公共课。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国内各大高校也实施了英语教学的改革，开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增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中国文化概论（英）》2006年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进行课程规划和试行，该课目前在我校教学体系中为英语专业任选课，未来该课程还有望逐步建设成为授课对象更为广泛的在线开放课程，不仅可将之作为英语专业的限选课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可以作为公共英语的选修课拓展大学生、研究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和文化素养，也能直接在海外面向没有汉语基础的大众讲授来传播中华文化。以《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为例，展示“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应用之法和成果，选题具有教学的现实意义和相关的学术价值，以及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深远意义。

教学上看，该课题进行的促进科研的活动，可以缓解教师的焦虑情绪，可以促进群体的合作，可以促成整个教学单位互帮互学的良好风气。《中国文化概论（英）》这门课程的改革对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思辨能力和创新理念大有助益；而且，这门课程的教改成果也为文化系列的其他课程提供了借鉴，将来可促进专业性对话，营造整个外语界科研和教学并列发展的氛围。

从学术上看，用合作性行动研究来指导《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改革将促进师生的学术思考力的发展，潜在地对学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文化各种论题贡献新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新鲜力量。一方面，合作性行动研究是教育改革中促进教师发展的一种方法，其中涉及心理学等原理和统计、调查等相关学术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概论（英）》包含了许多可以深入思考的话题和研究主题，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学术研究。

从国家层面看，合作性行动研究切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因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也契合中国文化战略，因为我们不仅需要激发国内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培养有中国文化意识的公民，也需要进行文化输出，引起

国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假设英文的《中国文化概论》编著得当，将可以作为孔子学院和中国研究的教材对外推广。

与本课题所关注的问题有关联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

其一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和“合作性行动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的问题。行动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英美等国家已相当普遍，而我国学者对行动研究的关注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行动研究指的是实践工作者试图科学地研究他们的问题以指导、纠正和评估他们的决策和行动的过程，学者 Kurt Lewin 1946 年出版的《行动研究与少数民族问题》和 1947 年出版的《群体决策和社会变革》确定了行动研究的三个步骤，即规划、采取行动、搜集关于行动的后果的资料。行动研究被广泛应用在很多的研究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学者 Lawrence Stenhouse 和 John Elliott 以及 Clem Adelman 在英国开展了研究者指导一线教师进行就课程改革问题的研究，开了“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先河，以后英美教育界把行动研究视为教师成长的必要途径，众多行动研究、合作性行动研究的成果发表。1992 年 Richard Sagor 出版的专著《如何开展合作性行动研究》从实战的角度教大家一步步开展课程相关的研究。可以说，行动研究、合作性行动研究在英美是备受关注的课题。

然而，本研究启动的 2006 年前后，在中国关于行动研究、合作性行动的内容主要是以介绍国外的研究理论为主，比如洪明 1999 年的文章《西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和转向——行动研究探略》、刘良华 2001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行动研究的史与思》、2002 年王蔷的著作《英语教师行动研究》和宋雪冬的文章《教学行为研究与教师自我发展》等。而关于教学实践的成果较少，同时期的仅有 2000 年彭金定的《实践研究与大学英语教学》和王笃勤 2004 年的小组合《合作学习行动研究》等数篇。近几年来，教育界普遍认为行动研究是解决教师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关于“行动研究与外语教学”这样的题目已经频见于中文报刊杂志，内容上看，大多数的案例都是针对中小学的，或者是没有针对性地对行动研究在外语教学中的意义等方面泛泛而谈，不少读者对象是“中小学英语教师”，对大学老师难有具体的帮助。



其二是关于《中国文化概论（英）》教学改革的相关研究。国内已经发表的文章中，谈中文讲授《中国文化概论》的比较多，像高艳丽的《浅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建设改革》（载《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年第4期）等，但没有论及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概论》的专著，相关文章的数量也有限。目前看，刘璐的硕士学位论文《英语讲授〈中国文化概论〉课学生学习动机及态度研究》（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中有一章涉及了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文的中国文化概论的动机和态度，其他内容多是在讲研究方法之类；吕芳的《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思考》（载《吉林教育》2013年第16期）一文，分享的是如何在国外用英语教外国学生学中国文化的内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文章，如吴新云的《论〈中国文化概论（英）〉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载《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有曲亮、吴新云的《〈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的“翻转教学”设计和功能》（载《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吴新云的《〈中国文化概论（英）〉翻转教学中“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探索》（载《外国语文研究》第8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等。

据此，以《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教改为个案探索外语教师间合作性行动研究的方案，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能推进教学，深化我们对行动研究的应用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播，而且有助于外语教师的自身发展，也符合国家发展的要求。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基础

除绪论外，本书主体部分分为六章。

第一章“合作性行动研究”概论是在应用该方法来进行教学问题研究之前梳理该方法的工作原理，通过追溯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发展历程、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特点和界定、教育领域中的合作性行动研究历史等来把握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基本原则、特征等，以便领会其精髓，获取其真谛。

第二章到第五章为一个循序渐进的整体，以“合作性行动研究”之法

对《中国文化概论（英）》的教学进行研究和改善。第二章“发现问题：《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现状”是对所开设课程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调查和分析，比如开课和教材情况、学习效果调查、学生的课程期待和前景展望之类，看投入、方法、心理等各方面有无改进之处，并且预期在调查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以引导外语教师对课程改革科研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本章三节撷取开课的必要性、在教材和授课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方向、对教师“角色”转变的期待为例总结调查结果。

第三章“改进教学：对《中国文化概论（英）》内容和形式的合作性行动研究”是解决方案的制订问题，并将方案付诸实施，这里主要是以课题组为单位进行“合作性行动研究”，要求一个群体的高度参与和互动，通过向专家进行咨询、定期交换教学科研的看法和进度、互评论文、学术会议后的汇报等一系列的行动进行科研能力的自我培训和提高训练，这个部分最复杂最难把握，也是这个课题成功与否的关键步骤。本章三节展示教学内容的专题设计、课堂教学中思辨力的培养、测试体系的建设所做的努力。

第四章“收集反馈：对《中国文化概论（英）》教学效果的合作性行动研究”是对解决方案的评价，对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这种总结有上课后反思等感性材料，也借助统计、问卷、座谈等标准数据，从而得出改进教学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也为下一个阶段的研究计划和方案做准备。本章三节聚焦关于“文化词汇教学”的反馈、关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反馈、关于师生“主体性”的反馈。

第五章“再次改革：对《中国文化概论（英）》的‘翻转课堂’的合作性行动研究”是第四部分评估后的新改革走向的描述，是我们多年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也结合了最新的教育改革的方法，可谓与先期内容步步相连，密不可分，指向现实问题，旨在改变现状。本章三节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的“翻转教学”设计和功能、学生“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教师推动学生“团队讨论”的策略这几个合作性研究的实践情况。

第六章展望合作性行动研究对教师个体、教学机构、国家都具有开展



的意义，怎样在这三个层面促成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开展。外语教师个体参与“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前景、单位支持大学外语教师进行“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前景、国家鼓励外语教师进行“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前景告诉我们：前人有经验可以借鉴，未来也有空间供我们去拓展，当更多老师组成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合作性行动研究教学团队，教育的改变极可能在某些方面影响到社会的变革。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原则。在欧美社会科学工作者那里，“行动”和“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工作；后者指的是专门受过训练的学者和专家对某些规律的探索。而“合作”一词，则是对群体行为的界定。因此，“合作性行动研究”指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比如运用观察法来发现问题，运用调查法来界定问题，行动过程也可运用实验等方法进行。正由于在实际研究中会出现不可能严密控制的条件，其研究结果可能不像预期的那样圆满。

本课题负责人自2006年参与《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教学，后来担任主讲教师（只在出国和休假时没有授课），自编教材，涉及面广，中英文资料均充分精炼，课堂设计用心，使用方法多样，力图以生动活泼的、易于被学生接受的方式进行讲授，同时注意提问和引导，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激发学生获取知识愿望，培养其思辨能力。所以，课题负责人对以“合作性行动研究”方法进行《中国文化概论（英）》教学改革有良好的教学基础。

教学研究方面，本课题负责人取得了一定成果。曾主持教学研究课题三项：“团队科研模式的探索：高校外语教师的合作性行动研究”，为高等教育学会自筹经费研究项目（06AIS0670011）；“硕士、博士研究生公共英语课分类教学模式比较研究”，中央财经大学2008年度研究生教学改革基金资助项目（08001001）；“批判教育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概论（英）》课程改革”，为外国语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一般立项课题。另外课程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数篇：《“批判教育学”对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载《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研究生英语词汇教学的“深化”策略》，载《研究生英语教学与研究（2011）》，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06月版；《外语测试反拨效应理论对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载《研究生英语教学与研究（2010）》，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06月版；《英语学习中的“文化需求”》，载《英语知识》2008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于《云南教育》2009年3月版。

学术研究方面，本课题负责人有坚实的研究工作基础，参加过多个重要的科研项目，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可以从宏观上把握研究的走向、计划，组织科研活动，修订解决方案，反思研究程序等。课题负责人在外国文学、美国社会和文化、翻译等方面的重要成果如下：主持项目“莫里森文学创作与美国国家认同研究”得到2015年度国家留学基金（留金发〔2015〕3012）支持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15BWW065）资助；主持项目“译介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课题负责人2002年6月取得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博士后资格，师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著名比较文学和译介学专家谢天振教授，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2003年7月，获得第3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课题负责人还参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此系国家社科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等等。课题负责人出版了《性别·种族·文化》（第二作者）、《译介学视角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身份的疆界：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等专著，《绿帘》译著一部，在《当代外国文学》《读书》《外国文学评论》《美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本课题成员均为大学外语教师，是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学术骨干，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学缘结构丰富，知识结构全面，大家都有热情和渴望，也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课题获得成果。就研究条件而言，我们可以依靠北京国家图书馆、本校和外校的图书馆及国外的图书馆获取与研究相关的权威而又及时的文本资料，我们拥有电脑及可以连接到因特网的必要的网络设备，也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及时汲取新的思想，追踪最新的学术动态。

第一章 掌握方法：“合作性行动研究”概论

近几年来，合作性行动研究“已经成为许多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Glassman, Erdem & Bartholomew, 2013: 272）。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定义多样化，但都特别强调“团队”与“合作”的功能，不把变化当成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认识到团体作为一个网络或者人与人互动的领域的重要性，合作能让大家分享目标，在社群的框架下促成变化。我们若是进行合作性行动研究，有必要先学习合作性行动研究发展历程，把握其特点，在汲取对我们这些外语教师来说可以运用的方法和流程之时，看出合作性行动研究对我们的意义。

第一节 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发展历程

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形成是在一定形势下许多人合力的结果，但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无法绕过大山，为合作性行动研究垫下基石，通过梳理下列行动研究发展过程的领军人物的重要活动和基本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由来和历程。

一、勒温的“群体动力学”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1890—1947 年）被视为“行动研究之父”（Car & Kemmis, 1986: 162），因为其在“二战”后重建时期的“群体动力学”理论是行动研究的基础理论，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其他重要人物都或是其学生或是其同事和朋友，都受到其强烈的影响。

勒温的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亦称“团体动力学”，该理论简

单说来即是，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团体成员对团体活动的兴趣、团体内成员的交往频率、各成员的遵从行为等也都能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内聚力。这里，勒温把团体视为一个动力整体，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必将导致整体内其他部分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到整体的性质。团体不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特质或相似特质的成员构成，特质相似和目标相同并不是团体存在的先决条件。团体的本质在于其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决定着团体的特性（Lewin, 1944; 1946）。

群体动力学理论是勒温把其早期研究个体行为的心理动力场或生活空间学说应用于“群体”研究的结果。生活空间包含了人及其环境。如果以 B 表示行为，P 表示人，E 表示环境，LS 表示生活空间，那么 $B = f(PE) = f(LS)$ ，意即行为随人及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行为随生活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生活空间中有三类事实，即准物理事实、准社会事实、准概念事实。“准”表示程度上虽然不够，但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看待。相对于客观事实，被个体觉察到的那些事实可能与真实事实并不一致，因此只能被称为“准事实”。同时，生活空间可以分成若干区域，各区域之间都有边界阻隔。个体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心理生活空间中随着目标有方向地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移动。勒温认为团体和个体一样都是真实的，而非神秘的，因此，以上生活空间的概念也一定适应于对团体的研究，可以把研究个体心理学的方法搬过来。勒温指出，个体和他的情境构成了心理场，与此相同，团体和团体的情境就构成了社会场；个体的行为主要由其生活空间内各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团体的行为也主要由团体的社会场中各区域的相互关系所决定。任何一个团体都面临着内聚和分裂对抗的压力，分裂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团体内各成员间交往的障碍或团体内每个个体的目标和团体目标间的冲突；内聚力则是团体内抵抗分裂的力量，内聚力是指团体成员间的正效价或吸引力，它的强度依赖于个体求得成员资格的动力强度。分裂和内聚是团体中时刻进行斗争的一对矛盾，一个良好的有生命力的团体必须要有较强的内聚性才能防止团体的分裂（Lewin, 1944; 1946；



1947a；1947b）。

群体动力学理论是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并被广泛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去。“二战”后，勒温开始与“社区间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mmunity Interrelations, CCI）合作，还领导一个旨在应对歧视和跨群体冲突的团队，这个“研究包含了勒温通常所谓的‘行动—研究’”，委员会的最高原则就是“没有行动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就无从行动”（Marrow, 1967: 144）。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调查诸如工厂生产、少数民族歧视、食品购买习惯这样的社会实践中完善了行动研究的观念。勒温常被引用的文章《行动研究和少数族裔问题》（1946），是针对克利夫兰社区关系协会负责人弗兰克·包德乌（Frank Baldauf, 1946）文章所谈及的群体关系的系列问题：“二战”后美国的民族团结解体，族群之间泾渭分明，让人想到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问题；需要知道该如何终止流言的扩散，如何不让父母用自己狭隘的视野来控制孩子所学，如何防止社区高端化，防止新人口对传统社区的侵蚀。勒温提出计划、行动、分析和再行动的“寻找事实”三阶段方案：第一阶段称为“解冻，即尽可能减少或消除与团体过去标准的关联；第二阶段引进或制定一个新标准；第三阶段是“再冻结”，这是建立在新标准之上的一种重新建构（Lewin, 1946）。在所有的这三个阶段中，个体都要参与团体的决定，这样比单是向每一个个体提出改变要求要好得多。

勒温也把合作性行动研究的观念带到教育中，在他看来，行动研究包含对问题的分析、事实的发现、概念的抽象；行动计划、执行，然后发现更多事实或评估；重复整个活动；真正地、活动呈螺旋式重复，行动研究“创造出学习社区建立的条件”（Car & Kemmis, 1986: 162）；他主张研究过程中小组合作，因为群体的互动能有力地促成人们态度、行为方面的投入和改变（Oja & Smulyan, 1989: 3）；行为上，他与同事帮助中小学老师运用“合作学习策略”进行行动研究，给学生设计出系统的合作活动，并在其教室中开展。同时，教师通过撰写教学反思日记（reflective teaching diaries）收集大量的数据，这项项目使得“行动研究”和“合作学习”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的核心课程（刘良华，2001）。